

实业诗人第一家

——郑观应诗歌研究 (下)

〔澳门〕 邓景滨

三、郑观应诗歌内容分析

郑观应在《七十生日感怀》中曾对自己的诗歌作了一句极为中肯的概括：“忧国新诗怀杜甫。”到了 79 岁高龄，他写下了《庚申己未两岁秋感》组诗 43 首，回顾了自己的一生，并再次强调：“新诗多是劫边来！”诚然，郑观应的“忧国新诗”，正如当年的杜甫诗一样，充满了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而且，忧患的内涵显得更深、更广、更新。他的全部诗作，贯穿着“反帝御侮”与“富强救国”的两大主题。

近代的中国，饱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抵御外侮，已成为中华民族的首要任务。每一个爱国者，无不以抵抗外敌的军事入侵为己任。郑观应作为时代的爱国者，亦写下了不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御侮诗。从鸦片战争到中法战争、中日战争，一直到八国联军入侵，这一页近代战争史，都在郑观应的诗篇中留下了炮火硝烟！

1857 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法联军攻陷广州，原因之一是粤督叶名琛误听扶乩，不作防备。当时郑观应 16 岁，但记忆犹存，直至 79 岁时仍不忘将它写入《庚申己未两岁秋感》第 35 首之中：

乱手谁人世鲜知，昔年粤督事尤奇。神仙垂示无庸战，英舰传闻有退期。

沙面船中忽放炮，观音山上竖降旗。通番得贿应天谴，底事逍遥任所之。

1884 年春，中法战争一触即发，郑观应奉彭玉麟奏调，由上海急赴广东，乘法国轮船往南洋刺探军情。《次彭雪琴官保师见赠原韵》一诗记述了这段史实：

探敌偏乘敌国舟，澜沧江外溯双流。班生不信无奇骨，冯翼今思奋远谋。

万里秋心驰鹿塞，卅年迁论划鸿沟。越王难禁冠纓短，惭愧终军志未酬。

十年后，中日甲午海战爆发。郑观应连接写下多首描写中日战争的史诗。例如，在《闻大东沟战事感作》一诗中，一方面歌颂为国殉难的将士，一方面谴责“曳兵弃甲”的逃兵，并一针见血地指出导致中日海战惨败的原因就在于“粉饰因循若养痍”！

东沟海战天如墨，炮震烟迷船掀侧。致远鼓楫冲重围，万火丛中呼杀贼。

勇哉壮节首捐躯，无愧同胞夸胆识。梁宏立志果不虚，生当封侯死庙食。

愧煞辽东众将弁，曳兵弃甲无人色。喧传中外尽惊奇，兵饷虚糜尚灭克。

那堪平旅如金汤，拱手让人千万亿。措置乖方咎孰归，春秋大义为贤责。

粉饰因循若养痍，堂堂师挫弹丸国。……

大东沟海战失利，国内“战败求和”之舆论甚嚣一时。郑观应一反众议，于甲午年底提出“战、守、备”三策，坚决反对乞和。他指出：如果屈膝求和，“臣恐中日战局甫从此终，中原之祸方从此始”。然而，懦怯的清廷，终于翌年（乙未）一月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赔款、开放商埠、让朝鲜“自主”、割让台湾澎湖列岛、辽东半岛……。郑观应目睹时局，不禁悲从中来，又想起为反对侵略、捍卫国家主权而殉难的邓世昌。就在 1896 年的元旦，写下了另一首歌颂邓世昌的五言排律《乙未元旦作》：

抚年五十四，旅食沪江滨。淮勇羞降敌，台湾恨属人。

鬢斑心益壮，血热语嫌频。棋局因循误，枢垣粉饰新。

忠贞怀邓左，豪气羞吴陈。何日逢知己，乘时荐国宾。

危言随毁誉，愤世独悲辛。北望云天近，东瞻岛国邻。

求成当岁首，史笔记王春。

诗中有两个小注。一是“邓左”下的小注：“邓世昌，左宝贵血战阵亡”。二是“吴陈”下的小注：“吴剑华、陈次亮”。注中的“左宝贵”是回族人，中日甲午战争时，率所部六营自辽东渡鸭绿江支援朝鲜，守平壤城北玄武门。日军来犯，平壤守军总统叶志超企图弃城逃窜，他即派亲兵监视，并登城指挥，身受重伤仍坚持督战，后中炮牺牲。诗中不仅抒发了对“降敌”的“淮勇”、割让台湾给日本的清廷充满了愤慨之情；而且，还对忠贞报国，誓死御敌的邓世昌、左宝贵表示了无限深切的怀念之情！

1900 年，八国联军入侵，义和团愤起迎击。郑观应虽然出于阶级的局限，称义和团为“拳匪”，且把八国联军的侵略行为归罪于义和团；但在《拳匪》诗中，却深刻而真实地揭露了八国联军的侵略罪行：

始纵烧教堂，继则杀公使。震动五大洲，八雄乘势起。

俄德兵最凶，杀人如犬豕。淫奸复枪毙，妇孺全惨死。
京津遭毒炮，屋宇成棘杖。玉石谁为分，兰艾同时毁。
春秋救邻国，大义岂如此。列邦各怀私，强秦更奇诡。

……

对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郑观应在其他的篇什中亦多有揭露，其中《读波兰衰亡战史书感》一诗显得分外激愤：
令我扼腕更拊髀，鹰瞵虎视心怆恻。借词保护干内政，不独官为彼黜陟。

纷索租界归自治，执柯伐柯计狡极。庚子辛丑约尤甚，江山惨淡无人色。

在外侮之中，郑观应最痛恨帝俄，每每以“强秦”代称，直斥这个“邻国”完全不讲“大义”，怀抱“奇诡”之志，“心狼若豺狼”。他在《书东三省俄兵暴虐事》中便揭露其虚伪面目，并一一历数其“暴虐事”：

俄志图北省，法欲据南方。昔创兴亚会，两国颇惊惶。
俄询日领事，何故意参商。中西皆友睦，邦交不可伤。
冀我会不成，迭问谁主张。佯言广贸易，不贪人土疆。
假我旅大口，修葺乃舟航。言甘似仁义，心狼若豺狼。
动辄肆阴谋，遑恤背盟章。所谋如弗遂，压以兵力强。
朝廷惟忍辱，日月暗无光。驱人下河海，视我如犬羊。
兵来占官署，兵去毁民房。暴虐竟如此，何时天罚彰。

……

帝俄不仅“占官署”、“毁民房”、“驱人下河海”，而且“戮屠如犬羊，焚掠甚马贼”（《哀黄人》），极尽“残刻”、“虐民”之能事。在《赠日本伊藤侯相三十六韵》中，进一步揭露帝俄“得陇望蜀”，企图鲸吞席卷的狼子野心：

痛哉列国议瓜分，虎视眈眈伺我隙。俄人阴谋更恣肆，直欲包举如卷席。

非特得陇还望蜀，不啻假途先灭虢。各国纷纷竞效尤，要求不得肆恣虐。

帝俄不仅妄图占我疆土，而且还想独霸天下，成其“霸主”之梦，对此，郑观应在《霸王歌》中有极为深刻的揭露：

中华五千年，历受外人侮。王者抚四夷，何反畏如虎。
矢口称黄祸，调兵保商贾。实欲继强秦，志在占疆土。
反是以为非，伤人说自取。纵兵毁民房，暴虐奚堪数。
只图略地多，不计殃民苦。复想匡天下，奉渠为霸主。
懋迁恃势力，欺人如乳豎。婪索不从心，强夺兼用武。
群雄竞效尤，轻藐我政府。……

对于列强的恣意侵略，应如何抵御呢？当时有人主张多引进坚船利炮，实行硬碰硬的兵战。郑观应则认为只凭兵战并不足够，购买坚船利炮硬碰硬，这只是治标的方法，并非治本的良方。郑观应认为治本的良方是“富强救国”。强兵固然重要，但强兵必须有富裕的国力作后盾，而这富裕的国力必须振兴实业才能真正达至。1909年中秋，在澳门郑家大院赋居了几年的郑观应，编著成十六册的《盛世危言后编》，并将他从19世纪60年代起“究心政治、实业之学”的宝贵经验总结在序言之中，将抵御外侮、图强致富、振兴实业和加强教育、改良政治等关系作了极为精辟的论述：

有国者苟欲攘外，亟须自强；欲自强，必先致富；欲致富，必首在振工商；欲振工商，必先讲求学校、速

立宪法、尊重道德、改良政治^[20]。

与郑观应同时代的思想家、政治家、实业家们，有的主张抵御外侮必须振兴实业，有的主张振兴实业必须改良政治；但如郑观应这样将抵御外侮、振兴实业、改良政治三者统一并有机地联系起来，却如凤毛麟角，实属罕见。洋务派虽然主张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科技，但不愿意在政治上实行民主制度，所以其洋务运动最终以失败的悲剧告终。郑观应则从洋务活动实践中，凭着冷静的观察和客观的分析，获得了超越洋务派的认知，主张在近代的中国只有建立与新型工商业相适应的民主政治，才能保障实业的振兴，才能达至真正的“富强救国”。

郑观应这种系统的“富强救国”的思想，集中体现在自强致富振工商的实业诗之中！这些实业诗所反映的内容非常广泛，也非常深刻，常常闪现出同时代哲人、诗人、实业家所没有的光辉智慧和超前意识，下面试从四个方面加以剖析。

（一）揭示振兴实业的目的 郑观应在多首实业诗中强调了振兴实业的目的在于富民强国，以利商战。他在《读〈管子〉有感》中开宗明义：“非富不能强，非强不能富。富强互为根，当国宜兼顾。”要富强，就要振工商，重商战，故在《答黄幼农黄花农蔡毅若岑馥庄四观察论时事》诗中明确指出：“富强从此卜，商战共筹边。”商战的作用，在郑观应的心目中是非常重要的，他多次强调“商战重于兵战”，“习兵战不如习商战”。因为只有通过商战，才能经济上战胜列强；也只有富裕的经济力量作后盾，才能做到真正的强兵、强国！“好凭经济纾时难，夜半闻鸡起舞同。”（《寄怀郑幼惺太守》）正是这种思想的真实写照：诗人将发展经济实力作为纾解时难的重要策略，它与枕戈待旦、闻鸡起舞的爱国将士的卫国、救国具有同样的重要性！

（二）反映振兴实业的内容 郑观应的实业诗所反映的实业项目，既具广泛性，又具先进性。在整个近代诗坛中，没有任何一位诗人像他那样，在诗中展现出如此多姿多彩、琳琅满目的实业名词。诸如：

《五十自述》的“德律风传百里音，电杆线捷飞轮驶”所提到的“德律风”，即 telephone（电话）的英文音译。

《上礼部尚书孙燮臣师四十韵》的“飞邮挟雷电，织轨走星虹”分别指电报和火车。

《上合淝傅相七排四十二韵》的“激轮飞电收权利，织雾开山救困贫”分别指郑观应亲自经办的四项企业：轮船招商局、电报局、织布局、开平采矿局。

在《劝农歌》诗中，更提到农业机械化的好处：“机器制新巧，便捷胜人手。”还提到类似今日的展览会，或称博览会的“赛珍会”：“复设赛珍会，奖励较妍丑。”在诗中自注提到俗称“肥田饼”的化肥：“美国新酵田饼肥田，丰收数

倍”。

有些实业诗，仅是诗题，就展示了一连串的新事物。例如——

《水陆师学堂各艺大书院博物会机器制造厂栖流工作所皆富强始基急宜创办赋此志感》一诗，在诗题中分别介绍了水陆师学堂、各种专艺书院、博物会、机器制造厂、栖流工作所。其中的“栖流工作所”收养与教艺兼备：“别有工作所，专教贫家儿。人各习一艺，糊口免化离。”

《广州商务总会告成拟设工艺院纪事》在诗题中显示了商务总会和工艺院，诗内则表明它们的功能和作用：“商会今告成，扶中筹制外。拟创工艺院，收养及穷丐。”

(三)总结振兴实业的措施 郑观应在他的实业诗中提出了振兴实业的多项措施，这些措施都是几十年“究心政治、实业之学”的经验结晶，其中有些见解甚至是超前意识的产物，直到今日仍然闪烁着他的先哲光芒！

郑观应在诗中强调要振兴实业，必须从资金、人才、管理这三个方面着手。其中资金是第一要素，而资金的筹集可以打破传统的独资方式，改用集股的方法，扩大资本，有利企业的建立和发展。例如，在《粤汉铁路风潮歌和大埔李生韵》诗中，就有“广东集路股，协众运同筹”，“股款若招足，洁身人罹浮”之句。在《自任路政备受谤言大局已定洁身而退赋长歌一章见志并示同人》中也有“路政赖维持，股款资擘画”，“公举总办后，人股更踊跃”的记述，诗中还有自注：“未举总协理时，共计招得一百六十五万股，现已得八百数十万股。”

郑观应在集资方面最具慧眼的是最早提出“中外合资”的新概念。他首先在《莫若篇》中提出：“既知难固守，旧章须改讎。莫若参外股，合力庶保全。得暇以图治，榷税助筹边。”又在《答英国广学会董李提摩太及世爵贝思福论中外时事》强调合股要注意掌握“利源”：“华夏矿路约同盟，合股举办利源握。达权通变互得益，解纷排难须从速”。在《上孙燮臣师相邓小赤师帅论时事》诗中更指出“中西合股”可挽救某些难以维持的矿产企业：“昔言矿产恐难守，中西合股或可久。”这些意见，和他在《盛世危言》中主张福建船厂“改官造为商造”、“与洋人合股承办”的观点完全吻合。在解决汉阳铁厂资金时，他也曾提出“与其借洋款，不如与洋人合股”的办法。可见郑观应的“中西合股”确实开创了“中外合资”的先河！为加速实业的振兴，郑观应还在《与周寿臣观察书》中大胆地提出了“万国公共商场”的设想：“闻东三省西藏各省强邻时欲侵占，与其留为外人蚕食鲸吞，不若大开门户，凡与列强毗连之边境及琼、廉地方，均辟为万国公共商场，如有外人愿入我国籍者，准其杂居，招集公司开办各项实业，吸引外人财力，振兴我国农工，或藉彼合力以保疆土，免为外人侵夺”^[21]。这里所提到的“万国公共商场”实质上就是现在“经济特区”的雏型！郑观应能在一百多年前提出如此大胆的设想，可见其胆识非同凡响！

振兴实业除了资金之外，还需要大量实业人材。郑观应在诗中充分表明了他的人才观。当时为了创办各种新式企业，学习西方的先进科技，吸纳西方科学的管理方法，故不少企业购买了西方的机器，聘请了西方的人员，郑观应称此为“楚材晋用”。这种借用人材的方法对于短期救急确有一定的好处。郑观应在《赠日本驻沪小田切总领事论时事歌》中便说过：“楚材晋用大可恃，哀职聊以资捕颡。”在《与通邃道友谈时事感作》中也说：“楚材晋用资援助，兴利屯兵借翼扶。”然而，任用西人必须小心谨慎：“中外亦有良歹人”（《保主权》），“楚材晋用防奸慝”（《读波兰衰亡史书感》）。这是郑观应经营实业数十年的经验所得。事实上，也确有一些被聘用的西人不守本份，恃势凌人，诸多刁难，甚至反客为主，颐指气使，一如郑观应在《客卿》中所揭露的：

客卿竟用我，非我用客卿。所以聘顾问，各国无不争。
干预我政事，反说因交情。非骗即恐吓，动辄要出京。
洞识我肺腑，视我如孩婴。……

所以，要从根本上解决振兴实业的人才问题，必须广设学堂，大量培养自己的人才！“倚人终失算，须求自强策。”“更辟大书院，文武当循辙”，“富强从此肇，外侮自可绝”！（《题何沃生、胡翼南〈新政真诠〉》）。

振兴实业除了资金和人才之外，管理也是非常重要的。本来一些很有潜质的企业，如管理不善，就会亏蚀甚至破产。一些因循守旧、不思进取的官办企业就更易蹈此覆辙。针对官办企业这种因循腐败，不合“商贾之道”的经营，郑观应主张改官办为民办，以重新焕发企业的生机。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当时号称“东亚最大的钢铁厂”——汉阳铁厂。汉阳铁厂是湖广总督张之洞督办，于1889年筹备，1891年兴建，1893年投产。它“兼采矿、炼铁、开煤三大端”，是一个官办的钢铁联合企业。由于经营不善，加上厂址与原料、燃料产地相距较远，运费昂贵，销路不广等原因，没法维持下去。此正如郑观应在《铁厂歌》所写的：

汉阳建厂地势卑，襄河水刷矾头窄。大冶采矿铁质良，转运终嫌一水隔。
……

马山煤劣强开炉，烈炬烧天天且泣。器成价较西来昂，停工待料作复辍。
洋匠挟制多纷更，总办无权费经营。翻译舞弊失物重，司农不允调水衡。
斯时英雄气忽短，仰屋无聊但扼腕。
……

由于亏损严重，官办的汉阳铁厂终告停产，于1896年改为民办，郑观应被委任为“总办”。他抓了三个关键：一是解决焦炭来源，二是解决产品销路，三是解决人才培养。结果，迅速扭转颓势，起死回生，此正如诗中所说：“奇谋猛得变通法，改官为商机可转。”后来，汉阳铁厂还将钢铁出口外销，令西方学者为之震惊，撰文《论汉阳铁厂装运钢铁出口将为欧美两洲实在之中国黄祸》，将这一事件视作“使人寝不安席”的“黄祸”，甚至比“强兵劲旅”更为可怕：

曩者华人梦昧西事，略无知觉，弃财于地，不足顾惜。今则狂睡初醒，昭光霍霍，振刷其精神，磨砺其胆略，以搜罗遗利，步武西法，宏兴工业，百度俱兴，一鸣惊人，加以选派学子，游习西方，以备将来回国，开发利源，其处心积虑，大足使人寝不安席。

呜呼！中国醒矣，此种之黄祸，较之强兵劲旅，蹂躏老羸之军队尤其虑也。^[22]

西方人对中国振兴实业成功的惊恐心态,正好印证了郑观应“商战重于兵战”的正确论断!

(四) 提出振兴实业的保障 郑观应不仅是一个杰出的经济实业家,而且也是杰出的思想教育家。他提出“振兴实业”的一系列主张,绝非单纯的“实业救国”;而是将实业、教育、道德、政治密切联系在一起。这正如前述的“欲振工商,必先讲求学校,建立宪法,尊重道德,改良政治。”他还强调:“盖宪法乃国家之基础,道德为学问之根柢,学校为人材之本源。”^[23]换言之,要保证实业的振兴,必须有教育、道德、宪法、民主作坚实的基础。

郑观应非常重视教育。他认为,治国需要人材,振兴实业更迫切需要人材。“楚材晋用”,聘用西人固然可以纾缓燃眉之急,但非长远之计,倘不狠抓教育、自培人材这个根本关键,那就等于舍本求末,始终未能达到真正的“富强救国”。所以,他反复强调:“教育为立国之本”,“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材为本;求才之道,以设学堂为先。”^[24]郑观应还强调:教育必须培养新型的人材,才能适应新型企业、新型社会的需要,所以他极力抨击封建科举制度的弊端:“五言试帖八股文,陈陈相因肆点窜。共知所学非所用,时运亨通擢仕宦。”(《治乱歌》)又在《时文叹》中指出八股文的危害:“一统好河山,八股人材送,前辙既已误,后车宜弥缝。”他呼吁“文士弃帖括,武卒改石弩”,要从新学堂中学真本领。他借鉴西方的经验,指出:“泰西大书院,富强之所基”(《水陆师学堂各艺大书院博物会机器制造厂洒流工作所皆富强始基急宜创办赋此志感》),“黎群须教养,义塾开万千。更建大书院,聘彼名师传。程式仿英法,所学贵精专。人才日蔚起,制造万物全。”(《答黄幼农黄花农蔡毅若岑馥庄四观察论时事》)在各类学堂中,郑观应最重视的是专科学校,因为专科学校各有专攻,最适合振兴各种实业所用。他曾说过:“凡每一事,必有一专业以教之。”文则有文学院,武则有武学院,农则有农学院,工则有艺学院,商则有商学院,欲为师者有师道院,此外还可设格物院、船政院、丹青院、律乐院等等,既有专长,又有利于发明创造。“各艺设专科,省试劳鼓舞。从兹智慧开,制作超欧土。”(《与小田切领事拟联中日在沪合设各种书院》)“专门学校多,人材自然盛。百艺无不精,气雄兵力竞。”(《答汪甘卿孝廉》)“学校贵专门,功专器自良。”(《舆潘兰史征君论时事感怀得五绝二十六首》之十一)“经济法律设专科,学优还资阅历多。”(《上孙燮臣师相邓小赤师帅论时事》)

为了有效地加快人才的培养,郑观应一面提倡广设学堂,另一方面主张多派留学生往外国留学、实地去“师夷长技”。他尤其羡慕日本广派留学生的做法,迅速振兴国力的做法。他在《美国肄业诸生并容沅浦邝容阶两教习》诗中表示:“翻羨东瀛佳子弟,日新月异愧吾华。”诗中自注还说:“日本肄业欧美子弟日新月异,望之感愧。”后来他在《赠广东制造局总办温颉园观察》诗中建议:“宜派学生赴欧美,各专一艺返国中。”郑观应坚信,只要切实抓好各项教育,培养各类人材,中国就会强盛,炎黄子孙就一定会创造奇迹,《时事感怀》之六,正表达了他的期望:

广设学堂资训练,多延教习励辛勤。会看四亿黄人种,奋起边庭树伟勋。

要保证实业的振兴,除了要培养专业人材的知识技能外,还必须注重道德的培养。因为社会的道德风气非常重要,它会影响到整个国家、民族的素质;而个人的品德修养,更会直接影响到对事业、对家庭、对朋友、甚至对国家的态度。有些人往往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见利忘义,只顾自己利益而不顾他人利益、民族利益;或只求个人利益而不顾廉耻,不顾道义。这种情况,郑观应深有警惕。他曾多次强调,教育必须注重道德教育,要培养爱国的精神。他在《答汪甘卿孝廉》诗中清楚地表明了“教育首德性”的重要:

小中大学堂,课本宜编正。由浅而入深,教育首德性。
小学知所爱,中学知所敬。大学穷哲理,有道砥其行。
日本为俄欺,蒙学作歌咏。自少入脑根,老来愤其横。
所以无贵贱,爱国不惜命。名留天地间,战死以为庆。

不仅学校要注重道德教育,在任用西人时也要注意考察他的人品,量才量德而用:“中外亦有良歹人,惟在权衡操诸己。”西人“薪水十倍厚华人,自应立品端行耻。”(《保主权》)

不仅振兴实业的中外人材要注重道德,管治国家的各级官员更要注重道德。郑观应在《答吴瀚涛观察》中强调:“先言人格举贤才。”又在《舆潘兰史征君论时事感怀五绝二十六首》之四,借欧洲议员为例,说明为官品格之重要:

欧洲举议员,首要问人格。品学兼优者,方能备选择。

由此,郑观应对中国的某些官员十分不满,强烈谴责他们“政出私门争党系,不言道德重权势。”“上下凭公乃济私”,“民生涂炭几时休”。(《庚申己未两岁秋感》)

郑观应对道德极其重视,还体现在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他之所以成为先进的思想家、爱国的实业家、杰出的教育家、博施的慈善家,和他注重道德培养、修身立品有密切的关系。在他的爱国新诗中,就有相当数量的修身诗。他反复强调“处世先端品,修身贵意诚”(《杂感》);“尊崇道德重文明”(《伍秩庸先生辞总裁仍护法巩固共和赋此志喜》);在《乙酉还家书以自勉》诗中告诫自己“不贪富与贵,但愿救同胞”;且以松柏不畏霜雪自勉:“诚恐满招损,居处常谦恭。霜雪任交加,不改柏与松。”一生与钱银经济打交道,更要清廉洁身:“冰心自矢盟天日,杨震清廉是我师。”(《乙酉道经香港有感》)

郑观应不仅严于律己,还严于训诫子侄。他在《训子》一诗中强调指出:“立志须求一等人,尊崇道德莫忧贫。英雄出处多穷困,功业由来俭与勤。”在另一首《训子》诗中又告诫:“须求颜子箪瓢乐,勿受人间作孽钱。”并告诫肄业于日本的子侄要戒烟、戒财、戒奢、戒色:“失业因鸦片,倾家为赌钱。富由勤俭积,花酒勿流连。”为什么郑观应如此重视培养道德、修身立品呢?他在《训子》诗的末章说得好:“人生富贵似云烟,道德能留亿万年!”

振兴实业,教育、道德固然不能少,但改良政治更是最根本的保证!要适应企业的发展,要适应社会的不断进步,不改良政治、不革故鼎新是无法达到“富强救国”的目的。他曾尖锐地指出:“政治关系于实业之盛衰,政治不改良,实业万难兴盛。”^[25]诚然,在改良政治方面,郑观应是一个温和的改良派。他认为当时的百姓,民智未开,不可急进,在君主专制、君民共主、民主共和这三种政治体制中,他最初是选择君民共主这条最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他在《呈张欧

治真人书》中写道：“历查中外史册，皆由君主而变君民共主，而君民共主而变民主。我中国民智未开，程度尚浅，欲由君主一跻民主，恐如法国革命流血必多。”^[26]直至辛亥革命成功后，袁世凯之流企图破坏民主共和，恢复君主专制时，他才在君主专制和民主共和两者之间选择了“民主共和”的道路。而在辛亥革命之前的数十年间，郑观应都在积极鼓吹设议院、立宪法的君民共主式的民主。他在《时事孔亟殊抱杞忧妄陈管见以备采择》中指出：“危急存亡秋，变法宜决断。”又在《书愤》中呼吁：“救时共发愤，变法尤贵速。”他多次强调立宪的重要：“宪法不行政难变”（《大舞台曲》），“政归立宪始文明”（《和何梅生太守感事诗》）；“合群立宪维新本，独守成规创业微”（《花甲初周感怀两律承诸亲朋赐和赋此志谢》）；“立宪维新本，安民定国基”（《驻俄法日各公使奏立宪法不成有感》）；“爱国立宪法，民情知鼓舞。”（《答朝鲜刘清岚并寄奉天陶在东孝廉》）。

郑观应非常欣赏英美的“三占从二”，即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原则，并极力将它引进，作为律例规条。他在《商务叹》中说：“律战大事应会议，三占从二有规矩。”为了迅速有效地振兴实业，在鼓吹立法的过程中，郑观应十分注重商务法例的制订。他在《海禁大开利权外溢甲午以从事变日亟盛杏荪京卿关心时局因赋长歌借相质证》一诗中，针对当时利权外溢的严重情况，向朝廷献上五策，其中第二策和第五策，就提出了商务立例的建议：

割地更偿费，痛深而创巨。何以当轴者，束手无建树。
债事误因循，寇将入堂庑。微臣独愤切，闻鸡夜起舞。
为献治安策，条陈计有五：其一设学校，士途宜宽取。
肄业专一门，材艺不逾矩。其二农工商，振兴有法度。
不但奖制造，矿务资铁路。其三练将才，兵强由将取。
巡捕兼民团，内地可安堵。其四制军器，工师慎选雇。
弗受外人胁，腹省尤宜顾。其五定律例，中外无偏护。
日报舆论院，公论如秉炬。……

诗中还有小注：“西例凡有制造新器给予执照，准其专利若干年，名曰不但。”“不但”即英文 patent（专利）的音译。这种保障专利权益的主张，在另一诗中也曾提及：“心裁果独出，国家与维持。专利若干岁，他人莫效为。于国有大益，定例奖厚资。日新而月异，百物足自资。”（《水陆师学堂各艺大书院博物会机器制造厂栖流工作所皆富强始基急宜创办赋此志感》）之后，他又在《答英国广学会董李提摩太及世爵具思福论中外时事》诗中提出：“整顿工商开利源，重订律例惩翻覆”。又在《上孙变臣师相邓小赤师论时事》诗中强调“不颁商律严赏罚，外侮频仍难折冲。”一再主张“省刑薄税敛，商律宜早设。”（《题何沃生、胡翼南〈新政真诠〉》）设立商律之后，还需要精通企业管理和商务律法的人去负责执行：“商律颁行宜认真，精其事者管商部。”（《商务叹》）如果这些做法能被朝廷接纳并切实执行，那么，对振兴实业必会有更大的裨益。

四、郑观应诗歌的特色和价值

对于郑观应的诗，时人的看法或许未能完全一致；但对其洋溢于诗中的爱国激情，却绝无异议。南社四剑之一的潘飞声，赞其为“诗中陈同甫”^[27]，“诗篇中国泪”。^[28]长沙萧荣爵则将郑诗与王粲、杜甫的诗篇并提：“伤乱每编王粲句，感时常写杜陵篇。”^[29]这些评语正与郑观应的自述“爱国新诗怀杜甫”有异曲同工之妙。

基于“忧民忧国心常赤”（《读张三丰真人闹中苦次敬和》）以及“清平志气功名澹”（《自动》）的思想，郑观应诗歌的风格既有慷慨激昂、豪气干云的一面，又有恬淡清和、温醇朴实的一面。他自言其诗是“随手写录”，多“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其实这正体现其诗“不立崖岸，不尚修饰，随事隶词，称情而言”的特点。顺德邓华熙知人论世，对郑观应诗有极中肯的概括：“盖山人忧世深，故其为文也剴切而中理；处己澹，故其为诗也平易而近情。渊如穆如，自道其心之所得，本不欲以诗鸣者，斯真善鸣者已”^[30]。湘乡刘麟祥则说郑诗“诗情如杜甫，雅韵若青莲。”^[31]胡昌俞也说：“陶齐为诗不规规于太白，而甚似太白。”^[32]

此外，郑观应诗虽以直抒胸臆为主，但亦不乏形象生动、富有诗意的描绘，如在《铁厂歌》中描写烟囱、洪炉的诗句：“高管插天云雾涌，洪炉泻液雷霆驱。”又如描写电报、火车的诗句：“飞邮挟雷电，织轨走星虹”（《上礼部尚书孙燮臣师四十韵》）。相对来说，郑观应的七律一般比较接近传统，也讲究韵律和意境；而抒写新事物或各项实业时，则多用七古或五古，形式自由，不受束缚，有较浓厚的民歌味，遣词用字也比较接近口语，而且将大量的新名词，尤其是经济领域的新名词入诗，其数量之多，范围之广，在同时代的诗人之中，确实罕有其匹！尽管郑观应的诗歌在艺术技巧方面仍未能排在同时代诗人的前列，但在题材的开拓、触觉的敏锐、思想的深度诸方面，却堪称走在同时代诗人的最前列！

综览郑观应的 726 首忧国新诗，按内容大致可分为述志诗、时事诗、御侮诗、实业诗、维新诗、革弊诗、修身诗、风物诗、题赠诗、谈玄诗。其中最具特色、最有价值的当是实业诗。

首先，郑观应实业诗的价值在于：展现了中国近代创业史筚路蓝缕的艰辛历程。郑观应出生于 1842 年，逝于 1921 年，他一生 80 年的岁月正好与近代史 80 年的风雨相叠（其叠差只有两年）。可以说：“他的历史就是中国近代创业史的局部缩影。他曾在“感赋七律八章籍记身世”诗小注中自述：“曾与同志创设机器、织布、造纸、电报、煤矿、开垦、粤汉广东铁路公司、广州总商会，又曾总办上海电报、织布局、轮船招商局、汉阳钢铁厂、开平矿务粤局、广东总商会协理、全国商会联合会广东商会代表。”郑观应自 17 岁起，一直至 80 岁逝世，在这 60 多年的商务中，先后参与了数项近代首创企业的组织和经营，如中国的第一个近代棉纺织厂——上海机器织布局，其创立是为了抵制洋纱洋布的输入。1890 年投产后，日产六百匹布，销路畅旺，部分地抵制了洋纱洋布。又如协助盛宣怀，集华商资本，自办电话，与电报之设相辅而行。又如近代第一个造船厂的福建船厂，亦由于他的提议而由官办改为民办。他负责总协理之后的汉阳铁厂，管理改善，产量日增，令洋人惊呼：“汉阳铁厂之崛起于中国，大有振衣千仞一览众山小之势，征诸领事之报告，吾人预知其不可量矣。中华铁市，将不胫而走各洋面，必与英美两邦角胜于世界之商场，其关系非同毫发，英美当道，幸

勿以么么视之。”^[33]又如中国第一家轮船公司的轮船招商局，摆明了与西方列强角于世界商场的架势，并战胜了西方列强的压价术，首先击败了美国的旗昌轮船公司，并全部收购了该公司的轮船和设备，收回不少的航运利权。这正好体现了郑观应的商战及“争回利权”思想的重要性和正确性。

其次，郑观应实业诗的价值还在于：揭示了中国近代振兴实业的一系列宝贵经验，供后人参考借鉴。郑观应是一位既高瞻远瞩又脚踏实地的实业家。他在“振兴实业”的一生中，“初则学商战于外人，继则于外人商战”^[34]，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加上他勤学多思，精通英文，且多次往来南洋，见闻广博。中年随父迁往澳门之后，经常往来于澳门、香港、上海这些中西文化经济交汇点，这对于他吸纳西方的先进思想极为有利。加上，他的一生虽然当过买办，但始终未有死心塌地、垂耳听命于外国资本家；他虽然也得过功名，但最终亦未有眷恋名利、俯首投身于封建仕途。他纯粹从民族利益出发，从振兴实业、富强救国的目的去观察、考虑问题；所以他在实业诗中所体现的思想、策略是比较客观且符合“商贾之道”的。也正是这一点，使他的经济思想走在时代的最前列。他的许多主张，例如中西合股，万国共同商场，商战重于兵战，富强为救国之本，教育为立国之本，振兴实业必须抓教育、抓道德、抓立法、抓政制改革，要适应新企业的发展就要培养新型的专业人材和管理人材等等，在今天来看，仍然是非常有价值的！

再次，郑观应实业诗的价值还在于：开拓了旧体诗题材的新领域，为旧体诗反映经济题材作了可喜的尝试。在中国源远流长的诗歌长河中，各式各样的社会题材，一一被摄入诗语，激起了一朵朵璀璨绚丽的浪花，各呈异彩：从《诗经》的民俗诗、建安的战乱诗到谢灵运的山水诗、陶渊明的田园诗，再到唐初的边塞诗、晚唐的爱情诗，以至各个时代的御侮诗、咏史诗、宫廷诗、咏物诗、宴游诗、隐逸诗、谈玄诗等等，庶几可谓“琳琅满目，无一不备”！然而，在郑观应之前的数千年诗史中，以振兴实业的题材入诗者，亘古未闻。与郑观应同时代的或有实业家兼诗人者，惜无甚实业题材入诗；或有诗人而非实业家者，更难有以实业题材入诗。大量将实业题材入诗的，郑观应是古今第一人。在近代诗坛中，论者往往偏爱于描写军事战争、捍卫国家主权的爱国诗篇，而忽略了反映振兴实业、力争民族利权的爱国诗篇。这是一个不应有的偏差。“一部近代史，就是一部中国人民爱国主义的斗争史、创业史。”^[35]郑观应的实业诗，以独特的内容、真切的笔触，展现了中国近代创业史筚路蓝缕的历程。它将与近代斗争史波澜壮阔的画卷交相辉映，永耀诗坛！

最后，郑观应实业诗的价值还在于：这些实业诗的被提出、被研究、被肯定，将会使这些实业诗的主人——实业家郑观应在近代诗坛占回应有的一席，这就是“实业诗人第一家”！

注 释

- [1] 郑观应《救时揭要·续澳门猪仔论》。
- [2] 夏东元《郑观应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5 年 11 月第二版，《前言》第 1 页。
- [3] 郑方泽《中国近代文学史编年》第 154 至 155 页。
- [4] 管林、钟贤培《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上册等 263 页。
- [5] 郭延礼《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第二卷第 1092 至 1093 页。
- [6] 马良春、李福田等《中国文学大辞典》第 3960 页。
- [7] 陈永正主编《岭南文学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第 719 页。
- [8] 郑观应《罗浮待鹤山人诗草》戊戌本“自序”。
- [9] 郑观应“罗浮待鹤山房谈玄诗草”之《述怀寄同门诸道友》。
- [10] 王韬《易言序》，见夏东元《郑观应集》上册第 61 页。
- [11] 王韬《易言跋》，见夏东元《郑观应集》上册第 168 页。
- [12] [18] 吴广霈《罗浮待鹤山人诗草序》，见夏东元《郑观应集》下册第 1245 页。
- [13] [32] 胡昌俞《罗浮待鹤山人诗草序》，见夏东元《郑观应集》下册第 1245 页。
- [14] [19] 盛宣怀《罗浮待鹤山人诗草序》，见夏东元《郑观应集》下册等 1241 页。
- [15] 同 [13]，第 1244 页。
- [16] 郑沅《罗浮待鹤山人诗草序》，见夏东元《郑面应集》下册第 1242 页。
- [17] 罗应旒《罗浮待鹤山人诗草序》，见夏东元《郑观应集》下册第 1249 页。
- [20] [25] 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自序》，见夏东元《郑观应集》下册等 11 页。
- [21] 见夏东元《郑观应集》下册第 414 页。
- [22] [33] 原载上海《万国商业月报》译稿，转引自《湘潭大学学报》1994 年第 2 期第 75 页。
- [24] 郑观应《致盛宣怀函》光绪二十二年十月初八日，上海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资料，转引自《学术月刊》1981 年第 4 期《试论郑观应的启蒙教育思想》。
- [26] 见夏东元《郑观应集》下册第 37 页。
- [27] 潘飞声《在山泉诗话》卷二，第 9 页。
- [28] 潘飞声《罗浮待鹤山人诗草题诗》，见夏东元《郑观应集》下册第 1249 页。
- [29] 萧荣爵《罗浮待鹤山人诗草题诗》，见夏东元《郑观应集》下册第 1250 页。
- [30] 邓华熙《罗浮待鹤山人诗草序》，见夏东元《郑观应集》下册第 1239 页。
- [31] 刘麟祥《罗浮待鹤山人诗草题诗》，见夏东元《郑观应集》下册第 1249 页。
- [34] 郑观应《覆考察商务大臣张弼士侍郎》，见夏东元《郑观应集》下册第 620 页。
- [35] 江泽民在 1990 年的“五四”讲话。转引自《湘潭大学学报》1994 年第 2 期 79 页。